

汤用彤中国佛教史研究方法探析

王欣瑞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汤用彤在研究中国佛教史过程中, 特别注重“同情默应, 心性体会”的学术态度, 主张用亲身的体验会通去领悟古人思想的精髓; 考证法和比较法也是汤用彤治宗教史常用的方法, 他通过周密的考证、系统的比较阐述了中国汉魏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佛教的发展历史, 理清了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史的脉络。

关键词: 汤用彤; 佛教研究; 方法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2X(2006)01-0009-04

收稿日期: 2005-07-16

作者简介: 王欣瑞(1973—), 女, 陕西府谷人,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20 世纪初以来, 佛教教义、思想及其历史的研究一直是佛学研究的热门课题。研究者的出发点大体可以分为教界、学界两大阵营。教界学者的共同特点是多怀有建立安身立命之本, 弘扬佛法的目的; 学界学者则不是为弘扬佛法而研究佛学, 其研究方法基本上都遵循学术界的规范。国学大师汤用彤将哲学、史学、文献学等多种近代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考据方法结合, 在研究中对佛学的特点有准确的把握。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 和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学讲义稿《隋唐佛教史稿》(1982 年正式出版), 用科学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佛教从印度传入到唐朝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点; 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互关系; 详细考察了中国佛教各个学派、宗派的兴起和衰落过程及其原委。他对中国佛教史料中关于佛教传入汉族地区的时间、重大的佛教历史事件、佛经的传译、重要的论著、著名僧人的生平、宗派与学派的关系、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等等都作了严谨的考证和解释, 并勾画出了全盛期中国佛教的框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发表后, 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好评。季羨林曾这样评价: “汤用彤(锡予) 先生就属于这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 决非我一个人之私言。在锡予先生身上, 熔铸古今, 会通中西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读造诣很高, 对汉译佛典以及僧传又都进行过深刻彻底的探讨, 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如数家珍。”^[1]

汤用彤学术思想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在方法上, 尤其能兼采古今中西, 表现色彩纷呈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其治佛学, 既立足于史料的精神缜密, 以史为鉴, 又非纯粹靠陈迹之搜讨, 而是以心性体会与佛教文化的精髓同情默应, 客观公正地评价过去。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文中道出自己研究佛学的目的是“昌明国故, 融化新知”, 借助于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 “俾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汤用彤在这个领域的贡献为后来研究中国佛学的学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研究佛学的方法也是供后来学者借鉴的宝贵财富。本文试对其佛教史研究中“同情默应、心性体会”的态度和考证、比较方法作一简单分析。

汤用彤研究佛教史, 始终强调一种治学态度, 那就是“同情之默应, 心性之体会”。他认为佛学应同情佛教徒的信仰, 对其心性有所体会, 不能只是在文字上考证寻求。出于这种认识, 他的研究客观持平, 严谨精细, 至今仍被教界、学界交相赞誉。研究宗教史, 史实固然很重要, 但由于感情和心理因素在宗教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 同情默应的态度对宗教研究非常重要。只有经体验会通, 才能领会古哲思想之精髓及其深意。同情默应, 心性体会是一种方法, 它力图通心灵的直觉, 设身处地与古人处于同一环境、氛围, 感受其愿望, 思索其行动, 体会其经历, 希望以此达到与古人的视野融合, 从而得到其行动、精神之真相, 尽可能地建构可靠的历史文化

原貌。佛学原为追求解脱而觉悟之道，他与人生的关系很密切，即以人的本性实现为第一要义。同情原则的哲学底蕴是耐人寻味的，在汤用彤看来，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实际是一种人生哲学，因而历史研究必须以心性之体会，才能去伪存真，才能扬弃糟粕，取其精华。这体现了一种近代学问大家的中正不倚的态度。汤用彤对佛教和佛教史相当熟悉，相当投入，他对真正有学问，有懿德嘉行的高僧大德怀有诚挚的敬意，从而能较切实地把握他们思想的真意和精要，同时他又不囿于佛教信仰，以开阔的视眼和清醒的理性指点人物，评说历史，比较异同，不以门户划界，唯以是非立论，故其学术著作能使教内外读者获得可靠的知识和多方面的启迪。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的跋语中，汤用彤对其学术方法作了以下总结：“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智慧发无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2]655} 汤用彤治佛教史向来被誉为无人能出其右，而他的这段跋文，则道出了他治佛教史贯穿始终的学术方法——同情默应、心性体会，这也是他留给后来治宗教史者一笔丰厚的遗产。

汤用彤研究佛教史另一个重要的方法即考据之学的应用。他的汉唐佛教史研究之所以成为治斯学者的工具与引导，至今近一个世纪尚无人能出其右者，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搜求之广，考订之详，以及建立在考证基础上平实的结论。任继愈曾这样评价汤用彤的著作，他说，“我接触过不少中外治中国佛教史的学者，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世界观，竟不约而同对汤先生的著作有类似的感受和评价，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原因是汤先生的著作贯穿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2]3} 汤用彤以乾嘉汉学治学方法作为他治佛教史研究的根底。在汉唐佛教史研究中，他引证参考了几乎与之有关的所有历史文献。从正史到野史；从学著作到笔记体

小说；历代僧传到各种索引；自内典因明到诸子百家；前及周世传说，后至近人《佛典泛论》；上有帝王诏书，下有俚俗之谈；既有巴利文，梵文原典，又有英美日本的历史文献。据粗略统计，仅《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五章《南北朝释教撰述》，汤用彤引证的译本、前贤注疏撰述，包括经藏、伪书、史地、传记乃至鬼神之作，达千种之多。这是汤用彤研究佛教信而有征的物质基础，也是他精考事实的先决条件。汤用彤佛教史研究中考证方法的应用无论是对事、对人还是对宗派道统，都是从书本到书本，在文字堆里寻找证据，他对书典的考证在汉唐佛教史研究中俯拾即是。除书中处处可见的引述考证外，每书设专章而且每章都设专节对佛典的翻译、注疏以及撰述予以详尽介绍、审查和校注。如对道安之经典整理、什公之译经、道生之著作、南北朝之译经、毗昙之翻译等，都是对书典考证的力作。汤用彤对《四十二章经》的考证，就可说明这一点。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专列《四十二章经考证》一章，从译经时间、文体结构、版本比较以及经的性质等方面来考证，并比照巴利文原典证明《四十二章经》是最早译出的汉文佛典。汤用彤不仅从文字源流上探索了中印文化的交流，而且从文化背景上肯定了佛教传入的历史环境，考证之中，《四十二章经》伪书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佛教至隋唐鼎盛，宗派竞起，为了争得和维护自身的正统地位，于是出现了传法的道统。各派为了自强其军，把自己的道统上溯很久，而且掺入许多真伪难辨的情节。所以研究佛教史，道统的考证则成为首当其冲的事情。这既是对历史的追溯，也是对学术思想的识别和清理。汤用彤根据南宋宗鉴《释门正统》和志磐《佛祖统记》，认为隋唐佛教宗派除天台外还有禅宗、华严、法相、真言、律宗及传世甚短的三论一宗，以及流行于民间的三阶教和值得商榷的净土宗。汤用彤根据他自己的宗派概念及中国佛教史资料，考证出中国佛教除各总宗兼修的净土之外，实有八宗，但其研究以九宗为对象。这实际上便是至今佛教史和佛学界沿习的宗派之说。

汤用彤是受过系统西方文化教育的第一代中

国学人，其研究方法中系统比较方法是最常用的方法。他的佛教史研究可以说系统地采用了比较宗教学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多维的比较，包括时序上的前后比较、自身发展变化的纵深比较、宗派间的异同及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离合、冲突、渗透的多方位的比较以观其会通和转化，其目的是揭示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反映不同文化的对峙以及在接触中的拒斥、吸引、渗透和互相推动的特征，以寻找文化变迁的脉络。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汤用彤用佛道思想比较的方法研究佛教的传入与佛道思想的调和；用佛玄思想的比较阐述了佛教发展及儒道释互相趋附的观点。汤用彤根据汉代佛法之流布，列《佛道》专章，从生死观、道德观、修行方法、宗教仪式、经义教理、布道形式等方面比较了佛道乃至儒家的思想。汤用彤通过大量考证，否定了汉明帝以前佛教入华的各种传说，大致确定了佛入中土当在汉明永平年中。接着，汤用彤又在比较中分析了佛教为什么能在那时输入，输入后的文化能否在新的环境中植根、发芽，他以争议较多的《四十二章经》为研究对象，并针对梁启超的“伪书晚出”之说，从内容到形式，阐明佛教传入的契机和初传时的文化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利用自己语言文字之长，取巴利文本与汉译佛典作比较，说明《四十二章经》源出西土；而且，“取其所言，与汉代流行之道术比较，则均可相通”，“汉代道术，必渐受佛教之影响，致采用其教义，如《太平经》，其一例也。”“然因经义与道术可相附会，而佛教在汉代已列入道术之林，此经因而为社会最流行之经典。”^{[2]34}初传时期的佛教，不仅与道家方术，而且与杂取儒、道、阴阳的讖纬之说兼收并用，这也正是汤用彤关于文化移植理论的第一阶段特征的描述：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因看见表面相同而调和。其《佛道》篇开首就曰：“《庄子·天下篇》举儒墨阴阳名法诸学，总名之为道术，汉初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以黄老之清静无为为道家。《汉书·艺文志》从之。然《史记·封禅书》以称方士为仙道。汉末乃有太平道。而东汉王充《论衡·道虚篇》，以辟谷养气神仙不死之术为道家。此皆后世天师道之始基。

而当时渐行流布之佛教，亦于此种道术。《牟子》称释教曰‘佛道’。《四十二章经》自称佛教为释道，为道法。而学佛则曰：为道，行道，学道。盖汉代佛教道家，本可相通，而时人则亦往往并为一谈也。”^{[2]65}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三国清谈、魏晋玄学乃是时代的特色。汤用彤通过比较，阐述了佛教思想在中国本土的深化及儒、道、释三家思想冲突后融合的大趋势。他认为，在汉末洛都佛教有两大系统。至三国时，传播到南方，一为安世高之禅学，偏于小乘；二为支谶之般若，乃大乘学。二者虽互有关涉，但其系统在传授上很分明。支谦传支谶之学，僧会注世高之经。支谦之学主神与道合，主明本，重智慧，所以颇附合于老子五千言之玄理，与当时玄风同流，乃大乘般若之学。僧会之说主养生成神，主养神，重禅法。重守意养气，上承汉代之道术，具有小乘的特点。据此汤用彤得出的结论是汉代以来的佛道将坠，而两晋新佛学将兴，中国佛教在中国的玄学化开始了。支谦即是开中国佛教玄学化之端的大家，由是也清理了中国佛教发展史的端绪。^[3]

随着时代的发展，汉魏之间和两晋之际，南北佛学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方转精义理，北方偏重行业，汤用彤对南北佛学的特点进行了直接概括后并作了比较，他认为：南统上承魏晋玄谈之风，重玄谈，讲风华，与玄学合流，体道探玄，探源返本，认为佛道之争，在理论纯用笔舌以义理较长短；北统下启隋唐佛家宗派，尚行事，讲风淳，与经学俱起，通经致用，杂讖纬知方术，认为佛道之争在权力，而且经常论道立说，以武力毁灭对方。北方传法途径主要是陆路而分南北，南方主要经海程，亦染北方之风气。在南北系统的地域比较同时，更注意不同文化流派的思想内容的剖判，多方位展现不同文化纵横内外的各种关系。

在《隋唐佛教史稿》中，汤用彤继续运用了对比较方法对佛教各宗进行了分析。首先，汤用彤提出了自己关于“宗”的看法，他界定“宗”的两种含义：隋唐以前的“宗”是学派的含义，隋唐以后的“宗”才具有教派的含义。“隋唐以前中

国佛教主要表现为学派之分歧。隋唐以后，经派争道统之风渐盛，乃有各种教派之竞起。”^[4] 汤用彤的观点是魏晋南北朝时，佛门只有不同的学派，其争议仅止于学说；隋唐佛教，则教派竞起，与以前相比，除学术分歧外，尚有道统之争。隋唐佛教也因为教派形成而出现了鼎盛的局面。接着，他专列《隋唐之宗派》一章，对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戒律、禅宗、净土宗、真言宗、三阶教等隋唐时期大的宗派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总结出“教派”是有创始人、传授者、信徒、教义、教规的宗教团体，这是它和“学派”的不同之处。

唐代佛法各宗竞起的鼎盛局面，既说明外来文化为适应新的民族理论、习俗的需要，在自我改造、完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转化的一面，同时还孕育着传统在外在思想的冲击和荡涤中进行改造的因子。汤用彤汉唐佛教研究始终着眼于印中文化接触过程中的冲突与调和问题，揭示了不同文化双向影响导致双方渗透、互补终致文化转化的逻辑必然性。他认为隋唐时期的佛教已具有“别开生面的中国理论”，“思想也是中国化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后，再也不是碎义难逃的两汉经学，也不是醉心于名教自然的魏晋玄学，而呈现出变为中国本位理学的必然趋势。这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自两汉之交第一次同外来文化接触，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一千年的冲突调和，至宋最终完成了自身的转化。原来作为印度文化的佛教，也在传统的影响下改变了性质，变成了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汤用彤在《五代宋元明佛教史略》一文中，

分析比较了影响佛教发展的内外诸多因素，从侧面向我们展现文化转化的连续性。他把佛教衰颓的原因归结为“外援既失，内部就衰”两个方面。所谓外援，一是历代帝王对佛法的崇仰；二是有助于佛学东渐的中西交通之通阻；三是本有文化排斥，包括力学的影响；四是国家的治乱。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了隋唐以后佛教在中国的衰颓。所谓内部因素，汤用彤认为宋以后佛徒自身素质的衰颓而致佛教走入左道；而且，佛理精微，“行之不远，只能关在庙里”则是佛学研究日趋淡化的内在原因。

总之，在汤用彤研究中国佛教史过程中，同情默应、心性体会的态度和考证、比较的治学方法一直贯穿始终。他著名的“文化移植”理论，即外来思想输入时与本土文化首先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接着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最后因再发现真实的相合而调和，也是他比较文化移植不同阶段特征而得出的结论。汤用彤对中国汉魏两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宋元明佛教史的研究都围绕文化移植理论展开，这也是他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中贯穿始终的主线。汤用彤独特的佛教史研究方法值得后学者借鉴。

参考文献：

- [1] 汤一介. 昌明国粹, 融化新知[J]. 中国文化, 1993(9):124.
- [2] 汤用彤. 汤用彤全集(第1卷)[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 [3] 麻天祥. 汤用彤评传[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103.
- [4] 汤用彤. 汤用彤全集(第2卷)[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209. (责任编辑: 苏晋生)

A Probe of Tang Yong-tong's Research Methods in his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WANG Xin-rui

(Institute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In his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Tang Yong-tong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n academic attitude of “sharing the feelings, understanding the thoughts”, which means to comprehend the gist of the thoughts of the ancient scholars by experiencing what they did. Besides, the textual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study are the other two methods often applied by him. Through a careful textual research and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he well illustrate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the Han, Wei, Dongjin, Xij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us sorting out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of China in this period.

Key words: TANG Yong-tong; Buddhism's research; Methods